

# 卞之琳致施蛰存函

■ 官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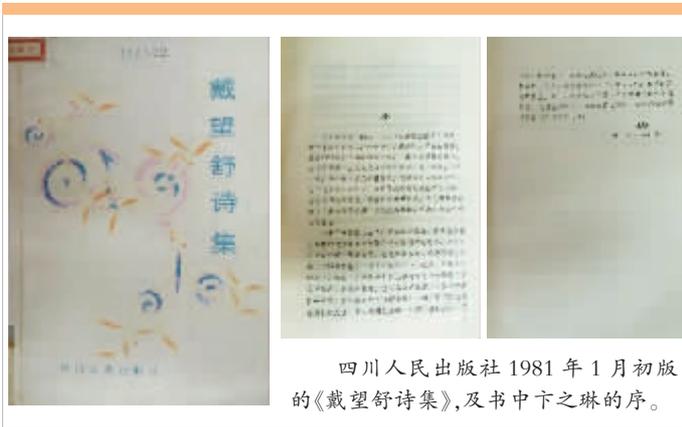
笔者在去年举办的“施蛰存旧藏 浦江清、谢国桢、卞之琳、郑逸梅、黄裳、闻宥、包谦六等友朋信札”专场,读到卞之琳给施蛰存的一封信,不见于三卷本的《卞之琳文集》《卞之琳作品新编》《卞之琳纪念文集》等各类集子,当为佚信。信的内容主要是就他为《戴望舒诗集》所作的序进行商讨:

蛰存同志:  
信稿都已收到,十分感谢你提供的意见和情况。

对于序稿头两段所论极是,我已重新写了,全篇都又抄改了一遍。我今年也进入古稀一关,头脑不行,下笔总不听使唤,漏字、错字、别字每每连篇,而自己一再看不出来,这次幸蒙指正,真是高兴。

我在文中提到“幻灭感”,是指政治上的,主要是1927年“四·一二”事件以后给许多人带来的,对望舒说来,我只是从诗本身而想当然(也参考了杜衡的一句话,还有艾青的一句话)。他对终年的感情,现在想起来,过去也曾有所闻。现在我在讲到望舒没有直接抒写那种“受挫折的感情”,改了后边一句为:“至于他的第一个诗集《我的记忆》的前半一部分少年作,显得更多是以寄托个人哀愁为契机的抒情诗,似又当别论”,不知较妥否。

“断指”一诗,我这次先根据《望舒诗稿》的排列,在“我的记忆”一诗前若干首,紧跟“雨巷”,可以说阶段上有交叉,它写在“记忆”前,后来借到《我的记忆》一书,注意到原排在“记忆”后。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初版的《戴望舒诗集》,及书中卞之琳的序。

《记忆》一集初版于1929年4月,发表在刊物上当不会晚于此日期。我现在文中也不再强调“断指”与“记忆”的写作先后了。

《望舒草》和《诗稿》里都有个别脱漏字,《诗选》里补正了。我还同意《诗选》把“的”“底”,都照现行办法都统一为“的”。《诗选》未入选的一首赠别刘呐鸥的诗里有一行“这的花香……”,《草》和《稿》里都未补正,良沛说应是漏一“里”字,显然对的。

我同意你的看法,《望舒草》的最后部分最为完美,所以文中也曾举例说到“深闭的院子”“寻梦者”“乐园鸟”等,虽然未加分析,而只对比分析了“灯”和后来

的第二首“灯”。现在《诗刊》要选登几首,我想就让他们从这几首以及“雨巷”“断指”“我的记忆”“用我残损的手掌”等当中选用吧。因为篇幅关系,不可能多刊发(上次我选徐志摩八首,因此也减为六首)。第一首“灯”,我虽在文中表示推崇,印在《诗集》里没有问题,发表在现行的刊物上,我还有点顾虑。

“回到心儿吧”,我在文中没有提名,只是说发表了八十八首后括号内补一句“确切说,是八十九首,望舒生前删去一首,也就不算吧”。我认为这首诗收在现在的《诗集》里会有损于望舒的声名,正如我担心第一首“灯”,因为个

别字眼,发表在《诗刊》上,会给《诗集》带来不利的影响。

《诗刊》决定5月份刊出我的短文和刊登望舒诗几首。你的“校读记”《诗集》里不可少。出书总要有几个月时间,从容写吧。《望舒诗稿》目录上有序,书里没有,但不像是撕掉的,很可能排印时抽掉的,找不到也就算了,如何?

……

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初版了《戴望舒诗集》,印数是七万六千册。书前有卞之琳1980年3月2日写的序言,还有艾青的《望舒的诗》。内分“望舒诗稿”“灾难的岁月”“集外”三辑,收诗九十二首,书后附录《诗论零札》和周良沛的《编后》。关于卞之琳的序和艾青的文,《编后》为我们提供了背景:“卞之琳同志出国访问,准备为外国朋友谈中国新诗的报告,就有一个题目——‘戴望舒’。他选了一些望舒的诗译成英文,也把自己准备的讲稿,又译成中文作本书的序言。同时,卞之琳同志特别提出:还要保留五七年出的《戴望舒诗选》上的艾青的序。”

信中提到“你的‘校读记’《诗集》里不可少”,指的是施蛰存为《戴望舒诗集》做的“校读记”。最终施蛰存写成了《戴望舒诗校读

记》,前有《引言》,提到,“周良沛同志已编好望舒的诗的全集,在他们的敦促和启发之下,我费了三个月时间,从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的报刊中检阅望舒每一首诗的最初发表的文本,和各个集本对校之后,发现有许多异文,有些是作者在编集时修改的,有些是以误传误的,因此,我决心做一次校读工作,把重要的异文写成校记,有些诗需要说明的,就加以说明,这个资料,不单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,也可以作为青年诗人探索艺术手法的一些例子。”不过,这篇《校读记》未能赶上《戴望舒诗集》,直到1993年4月,才收到施蛰存、应国靖编的《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戴望舒》的“资料部分”。

信中还说,“《望舒诗稿》目录上有序,书里没有,但不像是撕掉的,很可能排印时抽掉的,找不到也就算了,如何?”对此,施蛰存在《戴望舒诗校读记·引言》中作了说明,“1936年间,《我底记忆》和《望舒草》均已绝版,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愿意为望舒再印一本诗集……《望舒诗稿》于1937年1月出版,当时我不在上海,这个诗集,我没有见到。同年7月,抗战军兴,我到昆明去了,直到八年之后,胜利复员回上海,才见到此书。这部诗稿的‘目次’页上,第一篇是《自序》,但我看到三本,都不见有‘自序’,我也没有听望舒说过曾经写过一篇诗稿的序言,这是一个疑问。”但愿有朝一日,有研究者能为我们解答疑惑。

# 顾颉刚的一首白话诗和新文化运动

■ 朱洪涛

1919年2月,顾颉刚在《新潮》第一卷第二号发表白话诗《悼亡妻》(发表时署名“顾诚吾”,主要怕家人发觉,引起纠纷):

一

自你殁后,伊郁凄凉,填胸满意!  
不解我处顺境的时候,为什么爱听哀情的戏?

那《十万金》中,翠莲自缢未殊,对着两儿,千回百转,不忍舍弃;  
说道:“我死之后,一个在前厅叫着爹爹,爹爹有事不能顾及;一个在后园哭着妈妈,可痛你妈妈早已死去。”

我听了这一句,屡屡下泪。  
可怪这些话头,如今竟作成谶语,我真到了这般境地!

我望着两儿依恋我的态度,实教我无心作诗。  
长女初在识字,识到“父”“母”,知道他“母”寄顿殡房里。

次女方才学话,会说那“爹爹”“妈妈”,顾盼自喜。  
我对他说:“你叫妈妈已迟,可怜你的妈妈,已无从叫起。”  
他瞪目不懂,犹是叫声不住!

二

自你殁后,媒人来了数十起:  
不是东家知算能书,便是西家貌美姻家事。

闹得我意绪沈昏,苦无从遣止。  
老人责望,总是“有妇侍高堂;有子延宗系。”  
家庭养育,恩情高厚,我何忍别异?  
又旁无兄弟,下无男子,我何能径情

率意?  
从前的早婚,和将来的续弦,都似一工人,为东家服务;我亦拼做工人,不敢说自由趣。

但可怜我在你病榻旁边,重重申誓,而今何似?  
我不敢问你,我到底是有情无义?  
我愿你将入殓时睁睁的双眼,且安心的闭合。

我总信黄泉有路,待相会那年,把此情细理。  
顾颉刚诗中所悼亡妻是1918年8月去世的吴徵兰,该诗后收入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顾颉刚全集》。全集所用底本注明来自《新潮》,但差异颇大。核对原刊与《顾颉刚全集》,标点符号对不上有四处,字句对不上有八处。最关键的是笔者所查的《新潮》,其底本版权页写明“民国八年二月一日初版发行 四月一日再版发行 编辑者北京大学新潮社”,末尾并无“我愿你将入殓时睁睁的双眼,且安心的闭合。我总信黄泉有路,待相会那年,把此情细理”两句,不知是否系《顾颉刚全集》编者用手稿编入,或是另有所本。

若是细读这首诗,发现意涵颇不简单。此诗以第二人称“你”起头,便于直抒胸臆,“我”的万斛愁绪对着这样一个“你”倾诉。诗中将这种倾诉对话放置于多人称的交织中,既有你,也有长女、次女、他、老人等角色,显得层次感分明,且还有唱腔感。诗的结尾处作者问道:“我不敢问你,我到底是有情无义?”颇似戏台上一个人的独角戏,既是困惑的独白,又好似对着台

下观众倾诉他的哀伤与忧思,仿佛有一种现场感。诗中多处的问号与感叹号,既是理性的打量与情感的翻涌,亦是全诗韵脚之所在。顾颉刚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新旧融合的典型作品,既呈现出传统说唱艺术的特色,更呼应新文化时期的新诗潮流,表达现代人的情感两难,同时呼吁对女性的尊重。

对于顾颉刚而言,这首叙事诗同时也表达了没有独立自主的“我”的意思。假设全集编者真另有所本而我们又不及见的话,则“东家”在《新潮》上发表时变成“家中”,就文意而言情感与批判味道就淡了许多。“工人”与“东家”对举,突出旧式家庭无恩义无情感的一面,原刊的“家中”则显出作者心中的胆怯,不敢太过张扬撻伐,这相当能表现顾颉刚这一代新知识分子在新思潮的鼓吹下,既想着要前进一些,又怕家庭责难,因此留点余地的小退却。因为作为晚辈的顾颉刚不得不听从家里的安排,丝毫无商量余地,只能拼做“工人”,不敢说自由意志。

如果从新文化的大语境来打量这首诗,与此诗息息相关的是顾颉刚在《新潮》发表的长文《对于旧家庭的感想》。该文对旧式家庭中的种种现象予以深入揭露,其文气之酣畅淋漓,其说理之透辟三分,在新文化的语脉中似不多见。顾颉刚寻出旧家庭压抑个性的三大主义:一是名分主义,二是习俗主义,三是运命主义(运命主义因为顾颉刚文章没有写完所以没有谈到——笔者注)。这三条法则则是宰制与维护中国旧式家庭的“大经大法”。其中名分主义误人

不浅。顾颉刚所谓的“名分”指家庭中人虽没有爱情,但要葆有“最挚的爱情的形式”来装扮,这样使得外人看来亲密融洽,以博得好名声。实不知,落到最后就是虚伪、世故、冷漠。顾颉刚指出这种体系里,最受苦者莫过于女子。女子所受的苦楚顾颉刚总结为海无其深,天无其广。他用排比的手法形容这种惨苦:“我常临寝存想,这一天内:各个家庭中抱了愠怒的有多少人,想来总有数千万;破口相骂的有多少人,想来总有数百万;受气得病的有多少人,想来总有数十万;得病而于今天死的有多少人,想来也有数千;受气自杀的有多少人,想来也有数千。”这篇长文的意思实际上是上述诗作意思的深化。顾颉刚揭示“东家”对女子的压榨比男子要深重得多。

顾颉刚早年娶妻吴徵兰,吴不幸染病早逝,三代单传的顾家希望顾颉刚再娶,生一男孩。从顾颉刚丧偶到与之后的妻子殷履安定姻,时间是1918年8月1日到1919年1月10日。在一百六十余日内,平均四天相亲一次。顾颉刚解释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长辈的督促,又受媒人的逼迫,尤其是媒人,顾颉刚将其比作“掮客”,只为钱财,一张利口颠倒是非,淆乱乾坤,“来的媒人,真像货物的掮客:辞了他一家,他便再说出一家;今天说了一家,明天又来说两家;不到定亲,真教你烦得头昏脑乱”,顾颉刚因此觉得家庭就是“工场”。由此前后语境的关联与分析,顾颉刚的这首白话诗实在有太深的实感与体悟,将自己的亲历实感写入诗文,为新思潮的催动与潜移默化进献了一份鲜活材料。